

# 我的英文老师陈必第

口述/陈彩虹 整理/本报记者 司晋丽

又是银杏叶黄之时。北京的秋是人间天堂，红墙绿瓦黄叶交相映衬，置身其中，如痴如醉。而每到这时，陈彩虹就情不自禁地思念起一位远在天堂的故人——他的英文老师，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必第。

## 因“周末英语”结忘年交

陈必第是一位“华裔美人”。她出生于加拿大，幼时举家移居美国。20世纪30年代，陈必第老师以交换生的身份到中国岭南大学学习。那是年轻的她第一次来中国，自此结下了一生的缘。回到美国后，她与中国留学生张纪正喜结连理，并于1940年与丈夫一起来到中国定居，从事英语教学、翻译等方面的工作。

我与陈必第老师相识于1990年，彼时我在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部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又有对语言学习的热爱，听说一家子公司正办英语班，请国家外文局的美国专家上课，我想想方设法争取到听课机会。

上第一节课的情景历历在目——能容纳30人左右的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我找了一把椅子，坐在角落位置。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一定的毅力，学习外语很难坚持下来。陈必第那年已经75岁了，加之她只懂简单的中文，是用英文教授英文，这就“劝退”了大部分学生。两个多月后，教室只剩下4个人了。一天，陈老师课后说：“你们几个是我看着好的学生。我是半个中国人，不想白拿公司的讲课费。如果你们周末方便，到我家来学吧，不收费。”就这样，我成功地拜得了这位“大老师”。

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们几个都会准时到陈必第老师位于百万庄的家报到。这段经历，使我不仅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机会，还近距离领略了陈老师豁达幽默的风采，感受到她浓烈的中国情。

在上课时，我常常提前准备一些英语问题和句型，带着大家和陈老师互动，学习效果明显改善。很快，我的听力和口语都上了一个台阶。于是，我还顿悟出一个道理：必须结合英美文化、历史和生活事项来学英语，要不然还是听不懂、说不出。

由于我的名字是“彩虹”，陈老师直接称呼我为Rainbow。我曾经问过她，男性名字叫“彩虹”是不是不太好？因为经常闹出各种尴尬和误会。陈老师却说：“不要在乎，名字就是一个符号。如果你觉得这个

符号本身已经赋予了意义，就不要在意别人如何看它。”

“周末英语”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我与陈老师也成了忘年交。后来，由于国家对外国专家的照顾，她从百万庄搬到了友谊宾馆里面，环境和条件都比原来要好很多。那是一套公寓式的房子，陈老师住在一层，走出去就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只要我在北京，每周都会去看她，聊聊天或协助她做些中英文翻译的工作。随着工作调动，我先后到福建和韩国首尔任职，其间一直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陈老师联系，在不间断的交流中继续学习英语。

在陈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在《China Daily》(中国日报)发表了第一篇英文作品。在一次聊天中，我谈到对一个题目很感兴趣，陈老师就鼓励我用英文写出来，参与讨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英文稿件。初稿出来后，她只对个别用词做了修改。没有多久，这份中国唯一英文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中，有了一篇发自Rainbow Chen(我中文名的英文对译)的信件。那是真正的“豆腐块”，但对我而言沉甸甸的，毕竟是我的第一篇英文作品。陈老师为我打开了又一扇进取的大门。

## “滑稽(华裔)美人”

外文局专家每年都会受到国务院总理的接见，因此陈老师对历任总理的印象都很深刻。陈老师家里有很多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张是周恩来总理的侧影。“我特别喜欢周恩来总理。”她告诉我。正是由于周总理的亲自批准，陈必第于1963年加入中国籍。她的儿子张博道回忆，陈必第总是幽默地自称“滑稽(华裔)美人”。

长期在中国的生活，让陈必第对中国怀着第二故乡的亲近感。即使陈老师的子女们后来都定居美国，也经常邀请她去居住，但每小住一段时间，她就要坚持回到中国。在中美之间，她充当着民间外交的使者，通过说和写，让很多美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华裔美人”中的“华裔”，对于陈必第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符号，而是家的具体存在。搬到友谊宾馆后，陈老师高兴地说，自己有个小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那就是请我们一家三口在宾馆餐厅吃顿饭。按照中国人请客的方式，她负责点菜。考虑到我是湖南人，她周全地选了湘菜。那天，老人自己吃得不多，开心愉快地看着我们品尝美食。那不就是中国人祖孙三代共进午餐的典型场景吗？或许，这正是她心愿的另一层含义所在：中国是她家的家，家里有好多的亲人，这样的午餐就是在享受亲情。

在中国，陈老师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她为人低调，却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着中国。除了免费教学和在中国学外语外，在抗美援朝期间，陈必第将全部积蓄捐献献给中国



人民志愿军。我们都知道，她是在美国长大的，在中美发生战争时，她为中国捐款，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想，当时的陈必第心中未必没有过波澜，那时的中国固然贫穷落后，但她是半个中国人、中国儿媳，真正到中国生活后，她深深感受到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着的深刻变化，感受到中国人的友好以及奋斗不息的精神，这些都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某种希望，也促使她感动并去思考。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亲历的。1981年，中国恢复发行国债，在老辈国人眼里，购买国债是支持国家建设的善举，不是为了那点利息，陈必第也持这样的观点。1992年的一天，陈老师让我领着她到建设银行北京西四支行购买国库券。一位近80岁的“老外”为了这件事不辞辛苦乘坐公交车往返，如此热爱“第二故乡”，现在想起来都十分感动。

## 耄耋老人的政协情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陈必第每年通过提案等形式参政议政。20世纪90年代，引进外资是重要话题，她曾就此有过提案。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又在金融部门工作，协助她收集资料并承担一些翻译事务。在提案办理时，我还接到国家计委同志打来的电话。

2005年5月，陈老师迎来了九十大寿。我从首尔发邮件给她，祝福这位在中国生活近70年的“华裔美人”

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很快，她就回复了我，告诉我全国政协开会时，包括她在内的三位“外国专家”(还有爱泼斯坦、沙博理等老专家)，享受了一次“集体”的九十岁生日庆贺，十分温馨。还记得《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位记者对陈老师的采访稿：“北京城大雨倾盆。刚刚度过90寿辰的美国专家陈必第风趣地说：‘我要发电子邮件给我一个叫彩虹的朋友，大雨后马上会见到彩虹了！’”不久后，我回国述职，陈老师还安排过亲朋好友范围的小聚会，至今我还保留有庆贺她九十寿诞专门订制的一瓶红酒，上面印着她年轻时的照片。

一年后的五月初，因有段时间未收到陈老师的邮件，我从首尔多次打电话给她，均无人接听。我预感到事情可能不好。终于，一次电话通了，是陈老师的小儿子接的。他告诉我，老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放下电话，我有些不知所措，慢慢地走到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北京的方向凝望着，默默地站了很久。告别陈老师的那天，我请夫人前往八宝山，代表我送老师最后一程。

转眼，陈老师离开我们已十年有余。那个一生传奇、幽默豁达的女子，用她的人生架起了中外相通的桥梁，书写着人性的宽广与美好。如同陈老师年轻时的照片一样，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本文口述者陈彩虹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韩国首尔分行行长。)

## 文人轶事

施蛰存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郑振铎是民进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史学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收藏家。2023年是郑振铎诞辰125周年和逝世65周年。

施蛰存与郑振铎在上海曾有过人生交集。施蛰存与郑振铎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爱逛旧书店。抗日战争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都有旧书店。抗战胜利后，常熟路、襄阳路也成为旧书店集中的地方。文化人的癖好是相通的，施蛰存与郑振铎经常逛旧书店，寻寻觅觅，若遇好书，便如获至宝。

一次，在旧书店里，施蛰存遇到了郑

## 施蛰存与郑振铎的默契

周二中

振铎。当时施蛰存正拿着一部《秋风三叠》在津津有味地阅读。这时，郑振铎进来了，走到施蛰存身边，拿过他手中的《秋风三叠》，略一翻阅后对施蛰存耳语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

施蛰存见郑振铎话说得这样轻，马上会意，就悄无声息地并且装作毫不介意地把书递给了对方。郑振铎爱不释手，《秋风三叠》在这家旧书店中又找不到第二部，所以他生怕错过。施蛰存后来回忆：“我即使不把《秋风三叠》让给郑先生，我自己也未必买得起。而当时书店的伙计正在一旁，如果我稍不注意，伙计和郑先生议价时势必会开高价。”施蛰存与郑振铎的这一默契，给经济并不宽裕的郑振铎节省了不少买书的费用。

## 文人轶事

1930年夏，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国文考试题为《杂感》，臧克家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话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主考官阅一多看后，极为欣赏。一向判分极严的他，竟打出98分的高分。而后，闻一多又向学校力荐，最后将数学考试为零、根本无法录取的臧克家，破格录入青岛大学。

入学后，臧克家转读国文系，成为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非常喜欢闻一多诗集《死水》的深沉与凝练，决心以此为范本，学着怎样想象、怎样造句、怎样安放每一个字。他时常拿着自己新写的诗，到闻一多的办公室或家里请教。二人一起吸着纸烟，像朋友似地交谈着。谈诗过程中，闻一多会对臧克家的诗作出点评：好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哪个想象得聪明、哪个用得词太嫩。有时间一多会在认为好的句子上画上双圈。如果这句话正是臧克家所得意的，他会高兴得跳起来。

在闻一多的悉心教导下，臧克家很快

## 臧克家师从闻一多

王剑

便成为国文系出类拔萃的学生，先后创作出《炭鬼》《像粒沙》《老马》《难民》《元宵》等诗歌佳作。为了鼓励臧克家多写诗，闻一多还把臧克家的《洋车夫》《失眠》《难民》等诗作拿到《新月》去发表。《新月》是全国有影响的刊物，能在上面发表诗作，臧克家受到了很大的鼓励。

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自己的诗集《烙印》。因名不见经传，各大书店都不愿拿钱出版。闻一多得知消息后，不仅慷慨资助20块大洋，还亲自写了序言，予以推荐。《烙印》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茅盾、老舍、王统照、朱自清等纷纷为《烙印》撰文评赞。一时间，臧克家“像在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成为“1933年文坛上最优秀的农民诗人”。

对于恩师闻一多的教诲和帮助，臧克家感念终生。为此，他写下《擂鼓的诗人》《我的先生闻一多》《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等31篇诗文，表达自己“深深的敬仰和感激之情”。甚至到望百高龄时，他仍在说：“没有闻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 文人轶事

1934年11月，罗尔纲决意投身于中国的史学研究。当时有两个职位供他选择：一个是政府某机关的文书工作，每天只要写几封信，月薪160元，工作满两年就可以出国留学，这份工作真的是既轻松又体面，工资还高；另一个是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助理，工作是整理前人留下的3万份史料，月薪60元，这个工作不仅很辛苦，而且工资也不高。

当时，罗尔纲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打下扎实的研究史学的根基，就毫不犹豫地推掉了既轻松工资又高的政府某机关的那份工作，欣然接受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的工作。

对于罗尔纲的选择，有不少人都笑他是傻瓜，说他放弃了那么好的政府机

## 罗尔纲的选择

王吴军

关工作，其实就等于放弃了高薪的收入和出国“镀金”的机会，反而选择了一份既累又拿不到高薪的工作，真的是太傻了。然而，罗尔纲却觉得自己正在考古室里得到了一生治学的最大训练，直到后来，他依然由衷地表示，自己说不尽对这份工作的感谢。

后来，罗尔纲成了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训诂学家、晚清兵志学家，著有《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湘军兵志》《绿兵志》等学术著作。成名之后，罗尔纲依然说：“没有当年的傻瓜，就没有今天的罗尔纲。”

罗尔纲的“傻瓜”选择，其实正是他在治学道路上无悔追求的真实写照。

## 文人轶事

张骏祥(笔名袁俊)是我国著名的电影事业家、剧作家、话剧和电影导演，电影代表作有《白求恩大夫》《翠岗红旗》《鸡毛信》等。他在电影理论上颇有建树，参与主编了《中国电影大辞典》，出版了《导演术基础》等3部电影理论专著。

《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是部电影艺术论文集，1959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重版。书中对电影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规律、情节结构与突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创造性地发挥电影语言及运用电影手段等问题做了鲜明的阐释和论述，并从实践美学的角度言说中国电影，强调电影的电影性、民族性、群众性，重视电影的文学性。

1983年出版的《导演术基础》主要内容包括导演基本技术、导演艺术的基本规律、悲剧、喜剧、情节剧与伤感剧的导演等问题。张骏祥在书中阐述，导演是一门独特的学问，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导演的工作是理智的，同时也是情感的。一个优秀的导演应该能够理智与情感并重，更重要的是“能斟酌决定二者之间的调和和

## 张骏祥的电影理论专著

王荣 王抒澹

消长”。书中收录的部分论文曾在1939年—1946年期间分别发表于上海《剧场艺术》和大后方《戏剧月报》《戏剧时代》《戏剧岗位》等报刊上，对当时沪渝两地以及敌后根据地的话剧导演产生过重大影响。

《影事琐议》1985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提出要重视电影的艺术性研究，大力促进电影剧本创作，掌握电影业务，提高剧本质量，以及电影质量、电影文学、电影评论等有关电影创作的理论问题，还对当时欧美电影制作情况作了介绍。书中收录了《金鸡啼晓满园春》《写于金鸡初唱时》两篇文章，记述了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情况。

1980年第2期《电影文化丛刊》发表了张骏祥的《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他在文章中强调了在电影创作中文学价值的重要性，要重视影片思想内容和“剧场效果”，重视典型形象的塑造，电影创作要“兼容并包”，不应该盲目排斥叙述手段、抒情手段与“戏剧性”。“电影文学说”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构建的要素之一，在业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鸣。

# 竺可桢的读书生活

游宇明

竺可桢是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代表作《气象学》《物候学》久负盛名，在生命最后时刻写就的《中国近五千年前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被谭其骧称为“应属于世界名著之林”。民国时期，他出任过浙江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行政岗位上同样卓有建树。

如果要找个有关竺可桢一生的“关键词”，应该是读书。

竺可桢一生酷爱学习。两岁开始认字，三四岁即能背唐诗，认识两千多个汉字。五岁入私塾，能念《声律启蒙》，还能背《三字经》《四书》《五经》等等。竺可桢小时候家里经常出现的一幅图画是：同龄孩子在院里玩耍，他总在房里读

书。母亲担心他的身体，一度采取陪读的方式，到了她认为该休息的时候，就督促竺可桢放下书本。但竺可桢总有办法躲过母亲的监管，争取更多的阅读时间。竺可桢对阅读的兴趣至老不渝。五十多岁的时候，还专门请了一位俄国家庭教师，每天坚持用4至6小时，认真阅读俄文、英文、德文书，为日后跟苏联和欧洲国家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竺可桢不仅好读，还特别会读。王志毅一篇文章详细谈到了竺可桢的阅读。他的读书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专业书刊。他长期跟读综合性科学刊物，如《科学》《自然》等，希望获得自己研究学科的前沿知识。抗战时期，身在贵州的竺可桢读不到这些刊物，他便利用去重庆开会的机会，到美国新闻处借阅新进的科学与

知识分子类杂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能够读到外国刊物的地方很少，年届80的竺可桢患神经性耳聋，行动极为不便，他克服种种困难，经常去朝阳门外的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和中关村图书馆，阅读最新文献。1967年3月，《科学美国人》上曾有一篇外国人写的《中国的技术》一文，批评中国的状况尚停留在日本的15年前，竺可桢作了详尽的笔记，并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他的论断未必正确，他所看到的也不是中国尖端，但批评得对，我们也要注意。”

竺可桢还非常关注其他自然科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知识。1970年7月，他阅读了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这是一本跟物理相关性极强的书籍。1945年4月，他用心阅读了丹皮尔的新版《科学史》，并做了

详细笔记。1951年2月，他又阅读了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对其中的天文史部分作了评论。1960年1月，他收到李约瑟寄赠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随后详细阅读了这部书，评论道：李约瑟图书之渊博无与伦比，涉及的有些作品，“不但未见其书，甚至不知其名”。同时，他也记录了李著里一些引用和理解上的错误。

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竺可桢也非常关注人文社科类书籍。比如他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弗雷泽的《旧约全书中的民间传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中亚边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徐誉的《风萧萧》。

竺可桢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气象学前沿科技成果的追踪。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气象学跟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文学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精研专业的同时，也将目光投注到与专业相邻的知识上，希望以此促进自己专业上的精进，用知识的广度求知识的深度和创造性。

从竺可桢的阅读中，我们可看到一个人的毅力，更可看到一个人的见识！